

中国名碑三种

孟孝琚
熹寶子
熹龍顏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中國名碑三種

辛巳夏春張誠



孟孝琚碑

爨宝子碑

爨龙颜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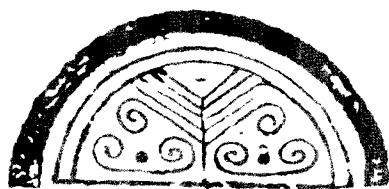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名碑三种

——孟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

主编：周文林
副主编：张诚
编委：郭伟 欧阳旭
朱仲元 翠娥
责任编辑：周文林 王曦云
拓片翻拍：张晓源 王曦云
装帧设计：王曦云



本社编

出版发行：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六〇九号）

印刷：云南国防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16

印张：8.5

版次：2001年8月第1版

印次：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86-793-3/J·489

定价：26.80元

出版说明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艺术和载体。书法风格因书家所处的时代、地域的不同而千姿百态。云南书法自有其特点，在中国书法史上曾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留存至今的《孟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这三碑对云南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文字学、民族史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向读者报告的是，前述三块云南名碑，有多种单行本流传于世。本次出版，至少有如下特点：第一，《孟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三碑合一，并按立碑年代先后顺序排版，形成一个云南古名碑的全貌，便于读者对照、赏析、收藏。第二，本次出版，选用的拓片稿，可称是现在我们能搜寻到的最好拓片，由于时光流逝，原碑的保护等因素，好稿难寻。第三，本次出版，在装帧、设计、开本、用材等各方面，均不敢怠慢，力求精美。

这里首次刊印云南著名学者书法家陈荣昌（一八六〇年——一九三五年）先生珍藏勘校补缺的《孟孝琚碑》拓本（详见筱圃先生一九二六年写在《孟孝琚碑》拓本前的小序墨迹），其碑文的清晰度是至今所见任何

『孟』碑拓片都无与伦比的。我们在此『孟』碑拓本中仍可见筱圃先生为『孟』碑残缺四分之一（七字）补缺的朱文小楷。《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经专家、学者考证皆为清光绪初年的拓片，其碑文的气势与字迹的清晰程度与先前很多『二爨』碑出版物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均为藏家所重。

值得欣慰的是，一九〇一年出土的《孟孝琚碑》到二〇〇一年刚好一百周年。因此，《中国名碑三种》的出版，也就是对《孟孝琚碑》出土一百周年的纪念。这三碑的拓片均来自原生地云南的椎拓高手，出版时又保留了原拓片的碑花痕迹，为至今出版此三碑所罕见。此外，每块碑刻前都附有适量的考证文字资料和一些重要的相关图片，以便加深书法爱好者、研究者对此三碑的认识和研究兴趣。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在二十世纪还未见到的那四分之一残缺的《孟孝琚碑》，也许会在新的世纪被发现，从而圆了云南前辈书家『孟』碑补缺的梦。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云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郭伟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多种关照并拨冗写序。

云南美术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目 录

序	三
云南惟一汉碑孟孝琚碑	七
『正书古石第一』的爨宝子碑	三三
『神品第一』的爨龙颜碑	六七

序

独步南境 卓尔不群

——彩云之南的三种古代碑刻

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碑版林立，数以万计。镌刻在石碑上的各体文字，形态各异、精彩纷呈。众多的碑刻，除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外，还留下古人多种风格面目的书法轨迹，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书法艺术宝库。其中三块碑刻，虽远藏边隅，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书法艺术长廊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就是现存于滇中曲靖的『爨宝子碑』、陆良的『爨龙颜碑』、滇东北昭通通宁的『孟孝琚碑』。

简质古茂『孟孝琚』

《孟孝琚碑》，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出土于云南省昭通市东南乡的白泥井附近，杨家冲子马家湾的一座汉代墓前。当时，经谢履庄、胡薪之等人将其运回昭通城内，置于昭通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履庄撰书跋文一则，另刊一石，附嵌于原碑末行空隙处。一九四五年冬，于昭通孔庙内灵星门前建一碑亭，《孟孝琚碑》即迁入该亭中嵌于壁内至今（此址现为昭通地区第三中学）。一九六一年，《孟孝琚碑》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孟孝琚碑》出土时，上截已断佚。碑现存残高一四〇厘米，宽一〇〇厘米，厚约二十四厘米，红砂石质。碑现存直行隶书十四行，

行二十一、十六、十、三字不等，共存二百六十字。残碑右侧刻龙纹，左侧刻虎纹，下方刻龟蛇纹。

《孟孝琚碑》拓本面世后，引起海内外诸多学者、书法家的重视。昭通胡国桢、谢崇基、谢饮涧、张宏楸，剑川赵藩，善化黄鹿泉，吴县王仁俊，宜都杨守敬，石屏袁嘉谷、袁丕钧、袁丕佑，钱塘吴士鉴，上虞罗振玉，元和杨宝铤，长沙郑业学，晋宁方树梅、刘颐，新会梁启超，腾冲李根源，东莞陈伯陶，海宁吴其昌，剑川赵式铭，姚安由云龙，丽江方国瑜等，对该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孟孝琚碑》上截断佚，众多学者以铭文用韵考据，推论所缺部分为每行七字，此乃诸家研究所得，似可为定论。惟因该碑上段已阙，年号无可确证。研究者多据碑文所存干支及碑末题名之主簿、书佐、铃下……等职名进行考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遂有西汉河平四年说（袁嘉谷、罗振玉、梁启超等）；东汉建武十二年说（黄鹿泉、袁丕钧等）；建安二十一年说（赵藩）；永寿二年说（陈伯陶、吴其昌、由云龙等）；永寿三年说（谢饮涧等）。细审诸家之论，是碑以东汉永寿年间所立为妥。

《孟孝琚碑》碑文简拙古雅，颇似中原汉代碑铭的行文方式。胡国桢称其『文辞雅健，深朴古茂』，赵藩称『文辞书法皆东汉人矩度』，王仁俊谓：『文词渊懿，分法古正』，方树梅云：『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经师手笔』。其与中原汉文化之渊源关系显而易见，足证众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之地的云南，于汉文化的输入及传播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

《孟孝琚碑》碑文书体为典型东汉隶书。其用笔结体均体现汉隶之宽博厚重，风格与《汉封龙山颂》最为接近，惟在整体布局上

较《封龙山颂》更为茂密，字里行间，时时透露出自然真率之气。前人对其评价甚佳，胡国桢说：『书法苍劲』；杨守敬说：『文字简拙』；杨宝鏞说：『由篆变隶之间……字内瑰宝也』；方树梅说：『隶法圆浑……两千载后累累得数百字，为海内汉碑第一，金石家无不肃然起敬』；由云龙说：『字体方整，浑穆淳厚，尤与《樊敏碑》逼似』；梁启超说：『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吴士鉴说：『审视字体，与《樊敏碑》甚为相似，当时西南微风气渐染，故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也』。其书法用笔沉横凝重，结字则圆转灵动。通篇布局稚朴活泼，既有隶书的端庄厚重，又具边陲书风的自然随意，视其为汉隶珍品当不为过。我国著名古代石刻研究专家赵超先生称赞《孟孝琚碑》为『一件罕见的南方碑刻，弥足珍贵』。

朴厚端庄『爨宝子』

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城南之扬旗田。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移至城内武侯祠。一九三七年，再移置到曲靖第一中学内至今。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宝子碑》通高一百八十三厘米，横宽六十八厘米，厚二十一厘米，碑首作圆形。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五行十五字。碑文十三行，行七—三十字；下端职官题名十三行，行四字。碑文除题名末行最后一字已缺外，其余三百八十七字基本完好。碑为东晋太亨四年（四〇五年）所立。所署太亨四年乙巳，实为晋安帝义熙元年（四〇五年），云南地处边远，或改元之诏未至，故仍用

太亨年号。

《爨宝子碑》，最早收录于清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云南通志》。其后，太仓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仪征汪鋈《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文韶、唐炯等纂修《续云南通志稿》，钱塘吴士鉴《九钟精舍金石跋尾》，腾冲李根源《金石目略初稿》，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等均有著录。

《爨宝子碑》碑文沿袭汉晋骈辞文体，文辞典雅，古意盎然，充分显现边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崇尚和学习。其字体则介乎隶楷之间，结构质朴，是中国文字由隶向楷过渡期间，文字形体发展变化的一件典型实证，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二七八年），曾下诏明令禁止立碑，流传至今的晋代碑刻甚少，故《爨宝子碑》尤为世所重。

该碑文字，采异体书写的字多达一百余字，开六朝碑刻书写异体字之先河。其中，简化省笔者：爨作𤇓、發作𤇔、辭作𤇕、陰作陰、賓作賓、隆作隆、幹作軒等；结体沿袭汉隶者：子作𠂔、偉作偉、操作捺、挺作挺、永作永、才作乇、裳作裳等；为结构匀称而增加点画者：别作𠂔、鄉作鄉、儀作儀……

其结字变化多端，颇有趣味，如『永惟平素』之『素』字作直长形，『位才之緒』之『位』字作横扁形，『不驚不崩』之『崩』字作斜状，『當保南岳』之『當』字则为纯正方形，『宮宇數仞』之『數』字放大，『耀与雲揚』之『与』字则缩小，『抽簪俟駕』之『簪』字甚密，而『太守』之『太』字又极疏。其随形结字通篇可见，体现出强烈的自然随意的书法风格。

其字之点画亦很有特色。点多作三角形，横竖起笔多作方笔，此当为六朝碑刻的先声。捺笔、撇笔则纯用圆笔，完全秉承汉代隶书笔法之遗绪。这些相互矛盾的点画结构与用笔方式，在该碑中混为一体，形成了极为生动活泼的气象。而千姿百态，别开生面，正是《爨宝子碑》最重要的美学特征。

其次，对同样部首的字，其部首的书写形态各异。如「水」部的「清、海、鸿、浪、滄、淵……」，三点的向背无一雷同；「糸」部的「緒、絆、紫、絜……」，「辵」部的「遐、道、通……」，「鳥」部的「鳳、鳴、鴻、鸞」等字，亦千变万化，奇姿百出。《爨宝子碑》的用笔结字，方圆正侧，大小欹正，尽显其妙。整体行气错落有致，顾盼生姿。可谓气韵生动，众妙毕具。如此丰富多样的结构样式，赋予该碑极具艺术表现力的形态构成，从而产生高深莫测，鬼斧神工般的艺术震撼力。

康有为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汪铨称「碑书朴拙，古气盎然」。这些评价甚公允。

《爨宝子碑》产生于东晋，其书体当属中国文字楷书的萌芽期。其时，楷书尚远未规范，当时的碑刻文字，如《齐太公吕望表碑》、《高句丽好大王碑》结构用笔多为隶体或多存隶意。处于书体错变阶段的《爨宝子碑》，既有隶体的朴茂厚重，又具有楷体的方严峻利。乍眼观之，貌类方整，细心揣摩，则其字无论简繁，均有大小、收放、聚散、伸缩的变化。其严谨之处，直如康南海「端如古佛之容」之谓，偶见率意，又现稚拙天真之趣，紧敛与恣肆的强烈反差，致使通篇气韵生动无比，其古朴面目之下，蕴藏着单纯的童贞之美。

《爨宝子碑》一经发现便名重天下，其浓烈的书法意趣和勃勃生

机，令众多书法家痴迷不已。仅二十世纪以来，沈曾植、李瑞清、李叔同、李济深、经亨颐、张大千、潘天寿、陆维钊、沈尹默、李苦禅等都曾对其进行过临摹和研究。

《爨宝子碑》具有高层次的艺术内涵，值得我们追求不舍。

雄强茂美《爨龙颜》

《爨龙颜碑》现存云南省陆县薛官堡。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龙颜碑》高三百三十八厘米，上端宽一百三十五厘米，下端宽一百四十六厘米，厚二十五厘米。碑额高八十三厘米，上端刻龙、虎、朱雀纹，中央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庾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六行、行四字，共二十四字。下端有穿，穿左右浮雕日月，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蟾蜍。碑阳刻铭文二十四行，行四十五字。碑阴刻职官人名三列，上列十五行，中列十七行，下列十六行，每行三——十字不等。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四五八年）镌立。因其碑体大于《爨宝子碑》，故俗称其为「大爨」。碑中记录了爨氏世系及有关职官、史实，颇具历史价值。

《爨龙颜碑》，最早记载见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明景泰《云南图经·陆凉州人物》、明嘉靖间周弘祖《古今书刻》、明万历初李元阳《云南通志·曲靖府人物》、明正德《云南志》等有记载。前人题跋见在：曲阜桂馥《札朴》、保山袁文揆《滇南文略》、武进陆耀通《金石续编》、仪征阮元《刻于碑左下角》、毕节邱均恩《刻于碑左侧》、仪征阮福《滇南古金石录》、乌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尾》、武威张澍《养素堂文集》、独山莫友芝《金石笔识》、临海洪颐宣

《平津读碑记》、仁和王言《金石萃编补略》、太仓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番禺黄炳堃《希古堂文集》、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文集》、山阴范寿铭《循圆金石文跋尾》、铜梁王璫（有正书局影印本）、仪征汪鋈《十二砚斋过眼金石录》、石屏袁嘉谷《滇绎》、腾冲李根源《景遂堂题跋》、姚安由云龙《定庵题跋》等。

《爨龙颜碑》面世甚早，拓本亦早已流传海内。阮元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来滇任云贵总督，倩拓工精拓后，分赠海内友好，是碑遂大显于世，名扬宇内。

《爨龙颜碑》碑文乃散文骈文结合，阮福称『碑文辞藻颇富』，李慈铭则称：『碑文瞻畅……文亦驯雅』。据碑文所载，文为爨道庆所作，于此可见，远在一千五百年前，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汉文化水平已具相当的高度和深度。

《爨龙颜碑》镌立时间晚于《爨宝子碑》仅五十三年，其书法体势和风格却发生极大的变化。『小爨』处于隶楷之间，字里行间多存隶书形态。『大爨』虽残存隶意，却已呈现成熟的楷体书风。康有为评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楷隶极则……雄强茂美之宗……若轩辕古帝，端冕垂裳』。其论书绝句赞曰：『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并列其为『古今楷法第一……神品第一。』梁启超称：『《爨龙颜碑》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阮元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桂馥说：『正法兼用隶法，饶有朴拙之气』。杨守敬评说：『正书自《葛祚碑》数字而外，此为最古。绝用隶法，极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醇尔雅，绝无寒乞之态。』此碑书法险劲简古，气

势雄强。结构多变，布局参差有致。用笔起始多用方笔，显示其峻利明洁。体势则舒展随意，又具雍容大度，雄强豪放之态势。结字的大小、方圆、正斜、疏密，随形造字，奇趣横生，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后世书家将其视为《张猛龙碑》、《嵩高灵庙碑》等峻美魏体书风之源。

刘宋一代历时五十九年（四二〇—四七九年），现今存见其时碑刻墓志，均为小型志石。气魄雄伟的《爨龙颜碑》当属其时之鸿篇巨制。庄严肃穆的气度，雄浑伟列的姿态，其所产生的强烈艺术震撼力，令世人肃然起敬。其高美、沉雄、奇石、伟岸，一如碑文所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二十六种民族共居于此，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中颇具地位的《孟孝琚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瑰宝，彩云之南的三种古刻石，必将『流芳风于千代』，与日月同辉，共天地长存。

郭伟

辛巳年小雨时节于研经庐

云南惟一汉碑

孟孝琚碑

在中国现存的碑刻中，没有哪一块碑刻的考证，像《孟孝琚碑》这样，一出土就引起那么多著名学者专家的重视。

一、《孟孝琚碑》的出土：《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九月在云南省昭通城南的白泥井“梁堆”（即“古墓葬”）之前出土。时任直隶（天津）清河道的学人谢崇基返里，他当即撰写跋文道：“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知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碣，间有勒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六朝后物。”这是对“孟”碑最早的首肯和考证。此跋文另刊刻一石附嵌在原碑末行的空隙处，现仍在。谢崇基，字履和，云南昭通人，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充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将授天津道，调署清河道。辛亥革命后，隐居天津。一九二三年病逝天津，贫无以为殓，时年六十一岁。在昭通，谢崇基、胡国桢等人遂将“孟”碑移置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保存，并在原碑出土处另立了“汉孟孝琚墓”碑一块，以示纪念墓主。今书楼拆除，“孟”碑现移昭通第三中学内，并建有碑亭保护。

此碑出土时，碑上端残缺，故又称《孟琚残碑》。残碑高一·四米、宽一米。碑文共十五行，主行残存二十一字，上应缺七字，约缺全碑的四分之一，隶书。碑文两侧有龙纹和虎纹，下有龟蛇纹，上原应有朱雀纹，这是中原汉碑及汉画像砖的传统图案风尚。

谢崇基携带“孟”碑拓片返回直隶（天津）后，约在一九一〇年间将拓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神州国光集》上。京、津为当时清朝政

治文化中心，此碑的出土，一经介绍，立即引起全国有关人士的关注。金石考据学家罗振玉、杨守敬、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等均先后对“孟”碑考证论述。在日本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书道全集》也载有此碑的拓片，足见它的影响甚广。

此碑的出土证明了汉代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昭通在秦汉时期正是“五尺道”上的交通要冲。孟氏为著名的“南中大姓”之一，孟孝琚自幼受汉文化教育，读过《韩诗》、《孝经》，其汉文学自有一定造诣。《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昭通地区“其民好学，多士人”，足见昭通是接受汉文化较先进的地区。此碑文辞典雅，在伤感感时的词语中，也偶见描述优美的写实文字。如“凉风渗淋，寒水北流”一句，写尽了滇东北地区山川气候的特点。

《孟孝琚碑》字体方正浑朴，就书法而言，能与《衡方碑》、《张迁碑》、《孔宙碑》媲美。汉代佳碑甚多，论其结体祇有方有扁而已，其用笔有圆有方有肥有瘦。《孟孝琚碑》是方体圆笔，在肥瘦之间，实为汉碑中不可多得的佳品。此碑的出土，又一次证明了汉代内地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按立碑年代论，《孟孝琚碑》是目前云南惟一的一块汉碑。阮元（一七六四年——一八四九年）称《爨龙颜碑》为“云南第一古石”，实际上真正的“云南第一古石”应是《孟孝琚碑》。只是“孟”碑出土时阮元已经去世五十二年了。

二、立碑年代考：《孟孝琚碑》是块汉碑，这已不存疑义。关键是此碑出土时残缺四分之一，因而给立碑年代，残缺文意的研究考证带来很大困难。在残存碑文的第一行开头有干支“丙申”二字，但无年号，茫茫两汉共四百二十六年（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〇年），

这当中八值丙申年。故关于立碑年代前后共有五种说法：一、罗振玉、梁启超、陈荣昌、袁嘉谷的西汉河平四年（公元前二五年）说。二、黄膺、方树梅、袁丕钧的东汉建武十二年（三六年）说。三、方国瑜的东汉永元八年（九六年）说。四、陈伯陶、吴其昌、由云龙、谢饮涧的东汉永寿二年（一五六年）说。五、赵藩的东汉建安二十一年（二一六年）说。据考证，西汉时立碑之风尚未盛行，且石刻传世文字均很简单。像孟孝琚碑这样洋洋数百言的碑文，西汉时在云南是不可能有的，甚至东汉初年亦不可能。从文风，字体，碑文中所见官制等作全面考察，此碑立石应为东汉桓帝永寿二年（一五六年）。『孟』碑与著名汉碑《礼器碑》同年立石，著名的汉碑多在东汉中期立石，那时隶书字体已趋成熟。鲁迅在一九一六年购得『孟』碑拓片，他认为『孟』碑立石在『汉末』，只说了一个大概的年代范围，亦有一定道理。施蛰存则认为在永寿二年丙申，或建安二十一年丙申，时间范围比鲁迅准确了许多。

三、关于残缺文意考：根据汉碑立碑制式及『孟』碑碑文内容考证推断，每行应缺七个字。要把这每行残缺的七个字文意补齐，这需有很高的学养和对碑刻的研究功力。最早补缺『孟』碑残缺文意的是陈荣昌（一八六〇年——一九三五年），他在一九二六年根据自己的学识见解，结合现存文意，把所藏《孟孝琚碑》拓本每行开头残缺的七个字用朱笔亲自点校增补。陈荣昌，字筱圃，号虚斋，晚号困叟，云南昆明人。光绪九年进士，曾两任贵州提学使，山东省最后一任提学使。先生精究滇中碑刻考证，对『孟』碑的补缺，实在是一大贡献。将来有幸找到『孟』碑上截，能以合璧，则将反证筱圃先生潜心研究滇

中碑板的结果。现将筱圃先生所补缺文（七字）及现存残文（二十一字）抄录于后，仅供识者对『孟』碑的研究考证。所缺文字用括号标明，以清界限。

（惟河平四年，岁在）丙申，月建临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卒，「一行」（呜呼哀哉，有志未）遂。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二行」（有得，欲比德于玉），改名为，字孝琚，闵其敦仁，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三行」（而孝琚先殒，是年）十月癸卯于荃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怀抱之恩，心「四行」（殊惨怛，勒铭示后。）其辞曰。「五行」（天地有憾，阴阳）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庵丧，「六行」（寝於世室，神魂何），忽然远游。将即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七行」（羨局永闭，重晤无）期。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八行」（哲人云萎，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自离。「九行」（譬彼良材，一朝倾）覆。恨不伸志，翻扬隆洽。身灭名存，美称修伤。勉崇素意，「十行」（镌石以文，载其清）皓，流惠后昆。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助于后人。「十一行」（乱曰：凤号、凤号、悲）失雏，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十二行」（天何。「十三行」武阳主簿，李煊字文采。书佐，黄羊字仲兴。「十四行」记，李昺字辅谋。铃下，任骠。「十五行」

张 诚

二〇〇一年一月

筱圃先生一九二六年写在《孟孝琚碑》拓本前的小序墨迹

雲南第一古石

丙寅二月四日斐題



此碑西漢時物歷二千餘年始出土字畫完好而石上泐痕与字畫相混或為辨改諸家釋文或認誤為瑣細孔為我予裝此本因以墨塗去泐痕專留字畫便覺字之明顯如此何至錯誤推以墨塗泐痕近於見戲而為訓也展玩清朗其結體之整齊而疏密較泐本易得其勢此所謂自遠已事不足為外人道也

丙寅春花朝前五日因斐識於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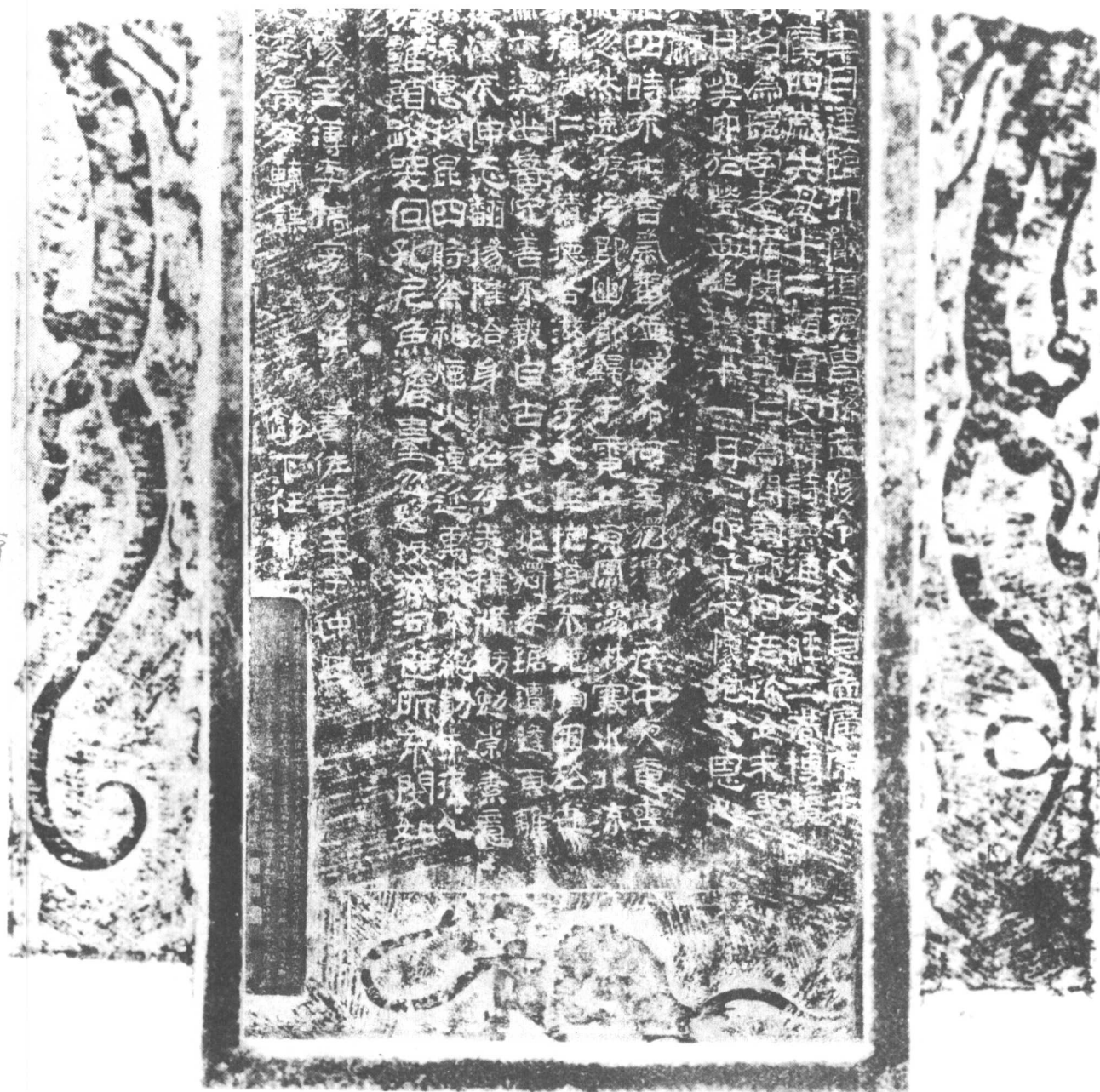
湖舊廬之次軒



碑在昭通郡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刻光緒二十七年九月
出土同里胡茂才國楨為余言之因偕往觀石高五尺廣二
尺八寸側刻龍形各一下刻物形若龜蛇其文辭古茂字
畫道勁方之漢中古刻遠過兩龔諸碑之上雖碑首斷刺
間有泐痕年代無攷然以文字揆之應在漢魏之間非兩
晉六朝後物洵可寶也遂移置城中鳳池上以藏焉
下臨諸辟間以俟博雅者古君子鑒訂焉是歲十一月朔日
郡人謝崇基跋



謝崇基跋



《孟孝琚碑》全拓片

(《孟孝琚碑》碑缺四分之一，故又称《孟孝琚残碑》、《孟琰残碑》)

南中用建臨
卯歲道君昌
孫武陽令之





